

核心话题

动力电池回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必答题

据公安部最新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达到1001万辆。有报告表明,我国第一批新能源汽车上的动力电池已经迎来了退役潮。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新能源车报废,这些电池该怎么处理,谁来回收?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更换、回收话题,实际上在前几年就引发了不少关注和讨论。但彼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仍处于刚起步的阶段,这个议题还带有一定的“超前”意味。现在,随着我国第一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迎来退役潮,电池回收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一般来说,动力电池的价格往往占到新能源汽车总价的3到5成,当它出现容量衰减需要更换,或者整辆车需要报废时,动力电池其实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价值。这是它能够被回收的前提和基础所在。通常,退役动力电池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处理继续被梯次使用。去年8月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

文/朱昌俊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动力电池回收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也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一道必答题。这道题答不好,就很可能影响到全社会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同度。

利用管理办法》就提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后,一般仍有一定的剩余容量,这虽然不能再满足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但却可降级用于储能、备电等场景,实现余能的最大化利用。比如,可以通过拆解重组,将它用于电动车。据媒体报

道,在湖北武汉,部分外卖小哥,已经用上了装备有“梯次利用电池”的电动车,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二是,退役电池中含有钴、镍、锂等多种金属材料,它们价格很贵,通过恰当方式提取后也可实现资源的再交易和再利用。

正是因为退役的动力电池仍有着较大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它的回收完全可以成就一个新的产业。这方面,国家层面已有相应的引导。如工信部最近就公布了全国1万多个动力电池回收网点。这为电池回收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不过难点在于,回收网点虽然有了,但退役动力电池在残值评估标准、梯次利用规范、溯源管理等诸多方面,都依然处于起步摸索阶段。甚至,用户对动力电池回收的意识,也还有待提升。

以梯次利用为例。拆解重组退役动力电池的企业需要哪些资质?重组后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再次投入市场?合适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这些方面如果没有一套清晰的标准,并建

立相应的规范机制,就很可能引发市场乱象,带来公共安全及环境风险。同样的,对电池回收的溯源管理之所以重要,也是要防止因为不当回收而造成退役动力电池在再利用的过程中放大环境风险。而还有一些用户根本就不清楚动力电池可以回收,这不仅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也容易助长“投机者”。因此,动力电池的回收体系虽然目前已初具雏形,但从市场发育,到机制、规范的完善,再到社会观念的与时俱进,都还需要一个过程。

从长远来看,随着相关标准的持续完善,回收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市场发育的更为充分,应该不必过于担心动力电池回收的问题。但关键就在于前期的探索阶段要做好过渡。应该看到,目前虽然迎来了第一批动力电池退役潮,回收需求快速上升,但新能源汽车的社会保有量较之于传统汽车仍明显偏小。这使得一些有着技术和设备优势的大企业,尤其是电池企业,目前对参与动力电池回收的兴趣与动力严重不足。由此就导致回收的规范性

和效率受到明显影响。如有业内人士就指出,成熟企业目前对废旧电池中锂的回收率已经能够达到90%。但它们目前参与率不够,使得至少一半以上的废旧动力电池依然是被小企业、个体户等收走,从而大大限制整个行业的回收率和回收规范性。此现状下,是不是也要考虑像最初对新能源汽车那样,给予电池回收企业一定的补贴激励,值得考虑。

应该看到,与传统汽车的报废、零部件回收相比,新能源汽车的报废和电池回收,除了目前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区别。那就是,动力电池回收和再利用对于环保的要求非常高,并且也对外部的规范依赖性更强。众所周知,新能源汽车之所以成为新的风口,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被认为较之于传统汽车更节能、更环保。而若电池回收环节不能做到足够规范,便可能产生较大的环保风险。有专业人士就指出,如果电池处理不当,会导致不可逆的环境污染,比如对土壤、对水系,以及相关的处理过

程当中产生的二次污染,都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而这影响的将是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价值基座。

因此可以说,动力电池回收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也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一道必答题。这道题答不好,就很可能影响到全社会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同度。对此,从上游的动力电池生产商,到下游的新能源汽车制造者,都应该对如何促进动力电池的高效、环保回收,有更多的思考和参与。同时,相关产业政策在结合现实的基础上也应该加速完善。

当然,目前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仍处于快速变革、更迭的阶段,退役动力电池回收体系的完善,也必然需要一个过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我们建立动力电力回收技术、产业优势的一个不错的窗口。若能够早点行动,抓住机会,在动力电池回收上,我们或许能够构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而这,也实际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

自由谈

对打工人而言,人工智能是敌亦是友

当人工智能打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围棋世界冠军,人们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会被机器人取代。当人工智能可以谱曲、写诗、绘画、编程,其水准不亚于专业人士时,人们害怕自己的工作被抢走。在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人工智能会不会迭代出更多的新兴行业和新型业态?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普通打工人应该如何面对和因应?这些都是我们都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在绘画行业,Disco Diffusion、Midjourney、DALL-E等AI绘画工具发展迅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带来图像生成的多重突破。人工智能所创造的“艺术品”充满想象力,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人们输入的关键词和指令,分分钟就产生一幅作品。这对于通过经年累月掌握技法 and 积累经验的专业画师来说,不啻为一种巨大的思想冲击和就业挑战。无论再高超的画师,都存在训练和生活带来的局限性,而人工智能画师却可以无限发展,其

文/马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要充分认识技术变革这一最大变量带来的不确定性,富有前瞻性地选择赛道和加强自身努力,从人工智能替代工作的危险区、慢变区转向安全区,避免在工作更新换代的大潮中遭遇不幸。

大规模艺术创造的成本也远低于人类。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敏锐地指出,新技术的出现会导致人们大规模失业,即所谓的技术性失业。在以蒸汽机和电气化为主要动力的第

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技术进步剥夺了大批手工工人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对大规模企业的依赖增强,而工人们则选择通过破坏机器来表达不满。人工智能引发制造业、服务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使更多工作机会消失。吊诡的是,人们对机器人的崛起和带来的威胁并没有表达强烈不满,而是对贸易和移民“抢饭碗”的问题耿耿于怀。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或在不久的将来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而这些行业的打工人也不得不谋求新的出路。李开复在《AI·未来》一书中评估了脑力劳动者的就业风险,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取代一些领域的工作。相对来讲,创意或决策型较强、强社交的工作,更不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优化型和弱社交的工作则面临人工智能的挑战。艺术家、美术设计师等就属于创意或决策型较强但是社交性较弱的工作,处于慢变区。虽然他们在当下的危机还不明显,但是在未来仍然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对打工人而言,人工智能是

敌亦是友,因此应两面看待人工智能对工作提出的挑战和带来的机遇。人工智能在淘汰一批工作的同时,也在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人们的工作更加富有意义和价值。大量技术含量低、重复性强和枯燥乏味的简单操作工作被淘汰,更多人的工作变得更加富有知识性和创造性。比如,过去经常发生的季节性工厂用工荒不再频繁上演,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对可以操作数控机床等智能设备的中高级技工的渴求。

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辛辣批判所谓的“狗屁工作”。这些工作在企业等用人单位中所占比例不低,但是却没有创造价值、完全没有意义、不必要、甚至有害。“狗屁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却被人创造出来。推动人工智能取代这些“狗屁工作”,显然是历史的进步。

理查德·萨斯坎德和丹尼尔·萨斯坎德在《人工智能会抢哪些工作》一书中指出,进入后专业时代,大量专业工作的工业

化和数字化,意味着律师、建筑师、审计师、医生、咨询顾问、会计师、记者等专业人士的工作变得更加日常化和商品化、去中介化、去神秘化,这些工作也需要更新转型。但是,“总的来说,生活在一个能够以低廉的价格甚至免费享用到大多数医疗救助、精神辅导、法律建议、新闻报道、商业协助、税务帮助、建筑知识的社会似乎更美好”。

人工智能意味着人工+智能,许多工作消失的同时,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工人和机器人协力完成,而人机协同也日益流行。对于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来说,要充分预见到人工智能会对产业和工作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并准备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

对此,托马斯·达文波特在《人机共生》一书中提出制胜未来工作的五大生存策略:超越,即建立全局观,弥补人工智能的决策短板;避让,即让人做人做事,机器做机器做的事;参与,即让我们与人工智能一起工作;专精,即找到那个没人想自动化的领域;开创,即创造支持智能

决策和行动的新系统。

作为打工人,要关注自己所在行业领域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可能对工作带来的影响。要充分认识技术变革这一最大变量带来的不确定性,富有前瞻性地选择赛道和加强自身努力,从人工智能替代工作的危险区、慢变区转向安全区,避免在工作更新换代的大潮中遭遇不幸。至关重要的是,不要想着和机器人赛跑和抢饭碗,而要突显自己工作的独特价值,并为人机协同的工作模式做好准备。

就业、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等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通过终身学习不断提升就业技能。要在中小学教育中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在高等教育环节调整学科设置和变革培养模式,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比如,绘画已不单纯是文科,而更多涉及信息技术。这需要跨学科人才培养,使从业人员有更多元的学科背景来胜任未来的崭新工作。

囊中江湖

对“网络售药乱象”需强化双“线”监管

随着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网络消费多样化,“网上买万物”似乎成为现实。然而,在网上购买某些特殊产品如药品则要小心。近期,多起网络违法违规售药事件被曝光,如杭州一男子网购“特效药”治病,结果对身体造成严重影响,甚至被医院开具了病危通知书。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在暗网销售“三唑仑”等精神类药物,“三唑仑”为国家一级管控类精神药物,大剂量服用可使人失去意识,俗称“迷药”“迷魂药”,其社会危害性可见一斑。媒体也在调查中发现,多家APP违规甚至违法销售处方药,网络售药乱象已然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药品购买及服用关乎民众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也因此,在传统的药品管理体系中,患者只能到指定场所(医院、药房),按照专业人员(医生、药师)的指导购买并按量按时服用,从而最大限度减少药品可能产生

文/华卿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网络售药治理是一项牵涉面广、各环节紧密相扣的社会工程,需要网络售药平台、用户与政府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在线上线下各个环节加大治理力度。

的各类副作用。

而网络售药平台的兴起,可以让用户更加便捷地购药,但随之也面临药品安全如何保障的命题。为此,《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药品网络销售活动由所在地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药品网络销售者应当是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资质的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网络销售范围不得超出企业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范围。而销售对象为个人消费者的,还应当建立在线药学服务制度,配备执业药师,指导合理用药。

应当说,《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网络售药参与各方的权责边界。此外,在此前的其他配套管理举措中,对于网购处方药则予以明确禁止,网络售药平台只能销售非处方药,原因在于处方药是指需经过医生处方才能从药房或药店得到、并要在医生监控或指导下使用的药物,具有更多的专业门槛和限制性,如果任由不具备专业能力的患者自由购买,很容易出现滥用药物、对身体造成不可估量损害等后果。因此,目前有关部门对于网络处方药销售仍未放开。

而种种网络售药乱象所折

射出来的问题,也即部分不法分子乃至网络平台为了谋取利益,无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患者健康,高价兜售假冒伪劣药品、管制类药品、处方药等,如此做法视患者安全如儿戏,如果不加以整治则会酿成更多的悲剧。

对于网络售药乱象,首先要实现全网监管体系的构建。近年来,网络新业态不断出现,如社交网络、短视频、直播等,某些不法分子乘机混迹其中兜售药物,这也给以往主要针对医药电商模式的管理手段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因此,有关部门应将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纳入其中,联合相关网络平台加大对药品网售的常态化监管,尤其是善用先进技术,如大数据、关键词自动识别等,加大对网售药品信息的层层过滤,及早发现各类违法违规线索。

同时,要进一步强化网络平台经营者义务,包括入驻主体审查、药品信息审核、交易安全保

障、产品追溯、应急事件处理等,网络平台都要制定对应的处理机制,相关信息等实现备案制,以便于出现问题后可以溯源倒查,从而夯实平台的日常履责,避免其成为网络售药乱象的帮凶乃至幕后推手。

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管理经验,如探索“网订店取”“网订店送”等新模式,患者在网络平台下订单后,由线下药店负责审核药方是否合规后方能供药,如此可减少网络平台的自由裁量权,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管理流程。

有关部门还应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问责力度,比如取消违规医师在线开具电子处方资格等,对医药电商平台建立红黄牌制度,按照其违规情节采取约谈、罚款、暂停其售药资格乃至取消其营业执照等处罚,对触犯法律的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刑责,还可鼓励民众对违法违规平台发起民事诉讼,从而不断加大违法成本,减少平台打擦边球的利益冲动之举。

除了以上举措外,有关部门还可设立药害赔偿基金,由各网络售药平台出资,一旦出现损害患者权益的事件,可从基金中划拨先行赔付,起到对患者及时救济的作用。

我国网络售药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对于在非正规途径购药的危害性,部分民众认知不够,有关部门要加大普及教育力度,通过公益广告、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人们提供网上合规购药的相关知识,逐渐树立起“网上买药无小事、谨遵医嘱服用药”的意识,从而减少网络违法售药的灰色空间。

由此可见,网络售药治理是一项牵涉面广、各环节紧密相扣的社会工程,需要网络售药平台、用户与政府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在线上线下各个环节加大治理力度,尤其是善用各类创新模式形成多方合作,达成治理合力最大化,不给违法违规售药以可钻缝隙,让更多人能买到放心药,推动网上售药行业的健康发展。